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徐大明 方小兵 主编



语言政策： 隐意图与新方法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以] 艾拉娜·肖哈米 (Elana Shohamy) 著

尹小荣 译

张治国 审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徐大明 方小兵 主编

语言政策： 隐意图与新方法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以] 艾拉娜·肖哈米 (Elana Shohamy) 著

尹小荣 译

张治国 审订

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艺术”资助项目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资助项目

江苏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资助项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8-8532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by Shohamy, Elana / ISBN: 9780415328654 © 2006 Elana Shohamy

Authorized Licensed Edi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的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Licensed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版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政策：隐意图与新方法 / (以) 艾拉娜·肖哈米 (Elana Shohamy) 著；尹小荣译.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12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 徐大明，方小兵主编)

ISBN 978-7-5213-0586-9

I. ①语… II. ①艾… ②尹… III. ①语言政策—研究 IV. ①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3673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张立萍

责任校对 鞠 慧

封面设计 高 蕾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0586-9

定 价 55.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305860001



作者简介

艾拉娜·肖哈米 (Elana Shohamy)，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及语言测试研究，2010年被国际语言测试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主要著作有《测试的力量》《语言景观》《语言政策》《第二语言研究方法》等近20部。在《应用语言学年报》《当代语言期刊》《语言学习》《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现实问题》《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等期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



译者简介

尹小荣，博士，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



审订者简介

张治国，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所长，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家外语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顾 问 (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 骏、陈章太、戴庆厦、李 崑、李宇明、穆夫温 (Salikoko Mufwene)、
斯波斯基 (Bernard Spolsky)

主 编

徐大明、方小兵

副主编

王铁琨、姚小平、范德博 (Marinus van den Berg)

编 委 (按姓名音序排列)

蔡永良、陈 敏、陈新仁、丁言仁、范德博、方小兵、葛燕红、
顾利程、郭龙生、郭 熙、刘丹青、刘 骏、王海啸、王建勤、
王 琳、王铁琨、吴志杰、徐大明、徐建忠、姚小平、张治国、
赵蓉晖

和谐语言生活 减缓语言冲突

——序“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语言（也包括文字）职能主要分工具和文化两大范畴，且这两大范畴又都有显隐二态。就工具范畴看，语言作为显性的工具是用于交际，作为隐性的工具是用于思维。就文化范畴看，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这是语言的显性文化职能；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是起到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

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要者有四：其一，统一民族语言和国家语言，消减因方言、语言严重分歧带来的交际障碍。其二，进行汉字的整理与改革，为一些少数民族设计文字或进行文字改革；当年还为这些文字全力配置印刷设备，近几十年专心于进行面向计算机的国际编码，使中华语言文字进入电子时代。其三，探索给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法，最终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使国家通用语言有了优越的拼写和注音工具。其四，大力开展外语教育，以期跨越国家发展中的外语鸿沟。这些语言规划，保证了国家政令畅通，为各民族、各地区甚至为海内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方便，为国家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

这些语言规划主要是改善语言的工具职能，当然也兼及语言的文化职能，比如一些少数民族的语音、文字规范化工作等。当今之时，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强势语言，全国已有 70% 左右的人口能够使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是响彻大江南北的时代强音。当此之时，当此之世，语言规划也应当以时以势逐渐调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重心应由“大力推广”向“规范使用”转变；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

规划语言的文化职能，首先要坚持“语言平等”的理念。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宪法精神在语言政策、语言观念上的体现。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

言文字、珍重各民族的方言,同时也要平心对待外国语言文字。

其次要具有“语言资源”意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土语),贮存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基因”,镌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文化身世说明书,滋养着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科学卫护她,传承研究她,开发利用她。

再次要理性规划“语言功能”。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各语言的发育状态和能够发挥的语言职能是有差异的,比如,在使用人口多少、有无方言分歧、有无民族共同语、有无文字、拥有的文献资料、适用的社会领域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或者大不相同。因此,应在“语言平等”理念的基础上,根据语言的实际状态进行合理有序的语言功能规划,使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在语言生活中各自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最后要遵循“自愿自责,国家扶助”的方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民族自治地方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生活,应当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的意愿进行决策,并为这些决策负责。当在进行和实施这些决策而需要国家帮助时,国家应依法提供智力、财力等方面的援助与扶持。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度,拥有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但也存在着或显或隐、或锐或缓的多种语言矛盾。对这些语言矛盾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就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发生语言冲突,语言财富变成“社会问题”。语言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一种,也是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宜于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近些年,中国的各项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变锐,许多社会矛盾也可能借由语言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中国也可能进入了语言矛盾容易激化甚至容易形成语言冲突的时期。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地进行语言规划,特别是重视对语言文化职能的规划,重视从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上进行语言规划,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就需要深入了解语言国情,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规划做到实事求是;这就需要着力研究语言冲突的机理,透彻剖析国内外语言冲突的案例,制定预防、处理语言冲突的方略,建立解决语言矛盾、语言冲突的有效机制;这就需要密切关注语言舆情,了解社会的语言心理及舆论动向,见微知著,提高对语言冲突的防范应对能力。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树立科学的语言观,特别是树立科学的语言规范观和

语言发展观，处理好中华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的关系，处理好母语与外语的关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并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和谐。

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学术上的改革开放。语言规划是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徐大明先生具有中外语言学背景，不仅自己学有专攻，而且数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具有学力、眼力和行动力。他所主持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此时出版，恰得其时，相信能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规划起到重要的学术借鉴作用。

李宇明

2012年12月12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内容提要

虽然我们可能意识不到，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方式总是会受到各种显性和隐性形式的管理。本书通过分析有关语言使用的各种决策，并关注这些决策对社会不同群体所带来的影响及潜在制约来探究语言政策实施背后的隐性意图。

艾拉娜·肖哈米以美国、以色列和英国的语言政策为例，介绍了一种扩展的语言政策观。她不仅介绍了政府、教育机构和媒体等所使用的显性语言政策，也介绍了一些隐性或隐秘的语言政策。本书分析并揭示了用于制定语言政策（如语言法、教育政策、语言测试、公民资格规定、宣传，甚至是教育材料）的各种具体机制。

这种对语言政策进行批判性探索的研究结论表明，我们需要用更加民主和开放的方法来制定语言政策。本书还提出了抵制某些不合理语言政策的策略、语言行动以及保护群体和个人语言权利的方法。

本书适合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学生和研究者使用。

“……妈妈，你为什么不把这本书叫作语言政策的隐性意图 (hidden agendas) 呢？”

(奥莉·肖哈米 [Orlee Shohamy], 2000 年 9 月 3 日)

奥莉，本书献给你。

通过“语言交流”(linguaging)，

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语言交流，你复活了。

通过语言交流，

我们的深入交流与深刻的爱得以持续，

并能超越时空，甚至死亡。

(艾拉娜·肖哈米，2005 年 3 月)

致奥莉

与奥莉对话

本书献给奥莉，因为她能运用各种方式（如语言、手势、体态、节奏、速度、舞蹈、表情、书籍、故事、无尽的会话等）来观察、表达和使用语言。

奥莉在多语环境中长大。她的母语为英语，同时，她也浸没在希伯来语的环境中，所以能用多种混合语码进行交流。她六岁之前直接接受英语教育。一年级时，开始习得希伯来语，当时别人认为她已经失去了使用英语的能力。有人称她是“未完全掌握多语的人”（semi-lingual），并研究她的“语言磨蚀”（language attrition），但事实上她是个“多语码使用者”：她会希伯来语、英语以及其他多种语言。在回到以色列之前，她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待了一年，那时她以为自己不会说希伯来语了，但她实际上仍能用“多语码”进行交流，并使用这些语言的各种表达形式。后来，她成了一名作家，她通过英语来仔细观察、感受、触摸和参与纽约市年轻人的生活，但同时她也能用“多语码”进行交流。奥莉生活在语言世界里，她依赖语言和使用语言，与她做伴的是语言、世界、音乐、舞蹈、故事、书籍、幽默、滑冰、欢笑、观察，还有……对话、对话和对话。

奥莉生于1975年9月3日，卒于2001年1月11日。令人十分“惊艳”（这是奥莉最喜欢用的一个单词）的是，奥莉是如何通过以下各种方式来保持“交流”以及使用“多语码”的：笑声、眼泪、欢乐、回忆、期盼、经历、哭泣、观察、交流和用她自己的方式书写的文章。我们一直保持交流，从未停止过。交流的内容包罗万象：我们看见的东西、观察到的人、做出的解释、令我们发笑的故事片段、阅读的书籍、使我们为之抗议的不公正现象、观赏的风景、挑战的理念、拍摄的照片、行走的路线、共同的思想、表达的观点、争论的话题、热爱的亲友、每日的食品、令人庆贺和哀伤的事件、聆听的歌曲以及常去骑车和溜冰的地方。

我们的语言中没有“固定的词汇”，没有完整的句子，也没有语用规则，但它却谱写出了最优美的乐章，它是两人的真实对话，但当达芙娜

(Daphna) 在场时则是三人的会话。这种对话深刻、深邃且有意义。这是我们在持续不断的、广阔无垠的人生之旅中所创造出的一种新语言。当我们遇到各种人生经历时，那正是我们学习该语言的好时光。这些人生经历包括前往新地方，感受新阅历，体会新感觉，出现新活力，遭遇新悲哀，遇到新痛苦，迎接新欢笑，产生新情感，提出新思想，储存新记忆，构筑新梦想，甚至展望新未来。这种语言是动态的又充满活力，将我们带到了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它时而陷入死亡，时而充满生机，但大多数时候是两者并存。这是属于我们的世界，一个自由隐秘的世界，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一个只有我们才能理解的新世界。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我们还在继续塑造这个世界，并从最大程度上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都联结起来。

序 言^①

本书的面世非常困难，近乎不可能。我曾一度确认我将永远不能再度写作或思考，只能坐在电脑前，淹没在悲伤、痛苦和“终结”的感觉之中。是奥莉及我身边的好人使我得以继续，他（她）们是达芙娜·肖哈米（Daphna Shohamy）和约拉姆·肖哈米（Yoram Shohamy）、亚伊尔·阿瓦尔（Yair Avgar）、梅里尔·斯温（Merrill Swain）、蒂姆·麦克纳马拉（Tim McNamara）、阿亚拉（Ayala）、雅各布（Yaakov）、萨拉·萨斯曼（Sara Sussman）、哈娜·肯德尔（Hana Kendel）、塔马·列文（Tamar Levin）、杜比·佩克曼（Dubi Pekelman）、阿拉斯泰尔·彭尼库克（Alastair Pennycook）、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埃伦·比亚莱斯托克（Ellen Bialystok）、本尼·哈利（Benny Hary）、大卫·尼沃（David Nevo）、安德鲁·科亨（Andrew Cohen）、马丁·魏因（Martin Wein）、吉姆·兰托夫（Jim Lantolf）、米丽娅姆·哈达（Mirjam Hadar）、奥弗拉·因巴（Ofra Inbar）、多顿·莱谢姆（Dotan Leshem）、纳维特·内夫（Navit Nave）、斯马德尔·德尼茨-施密特（Smadar Donitsa-Schmidt）、乔纳森·莫泽斯（Jonathan Mozes）和露易莎·塞姆列恩（Louisa Semlyen）等。每当我悲伤时，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体现他们最好的友谊、关心、支持、理解、宽容以及充满善意、愉快和活泼的陪伴。我以我的生命来诚挚地感谢这些人，他们给了我无尽的爱，分担了我的痛苦，帮我敞开心扉和直面现实，并使我认识到我仍有无数的理由活下去。

我要把特别的感谢和爱献给达芙娜。在我极度悲伤和痛苦的时候，她与我手牵手、心连心地并肩前行。同时，我们还与奥莉一道共同与命运抗争，设法重燃生命之火，以至于我们后来仍不停地问：“这是现实，还是梦魇？”达芙娜，你深谙当我们绝望地寻找我们的共生“他者”奥莉的黑暗世界时，聚焦中心、集中精力、写作、阅读、工作、研究以及寻找快乐时刻的含义。感谢你给予我的温暖、关切和理解！也感谢你与我共同分担生命中的痛苦并与我一起欣赏生命中的美丽、活力和意义。

① 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者注，下文不再注明。

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他们是我在学术世界中最好的馈赠；他们渴望学习、探讨、争论和挑战；他们还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知识源泉。在我返回工作岗位的第一天，2001年“语言政策”冬季班的学生就坚持让我谈谈奥莉：她是谁？她做了什么事情？她长什么样子？她有什么梦想和渴望？能与学生进行公开、平等地交流，这种感觉是独特的。我要特别感谢2003年“批判性语言教学法”秋季班的学生。通过该课程，我们彼此变得非常熟悉，每个人都是大家眼里的“其他人”，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而已，无论你在政策执行、歧视、权利、恐惧、公平、话语、身份、沟通、边界、认可、正义、抗议、刻板印象和困难等各种环境中，成了语言的“受害者”，还是扮演了语言的“赢家”；也无论你是被边缘化的人，还是优势突出的人。该课程主要是将批判性理论应用于一部分人的现实语言生活中。这些人包括以色列的俄罗斯移民、正统犹太人、女性穆斯林和“使用强势语言的多数人”，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以色列的语言概况。以色列是一个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和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社会，任何一个想得到的因素，如语言、性别、民族、宗教、政治、左翼、右翼、本地人、移民、忠诚、军事、爱国主义、领土、职业、民族主义和和平等，都有可能引起社会变化。因此，我们在探讨以色列的上述各种问题时，不能忽视它们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一个愤怒、忧虑、紧张、歧视和抗议因素时不时出现的社会。但沟通、讨论和对话的可能性在这里也是存在的。2003年12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访问，验证了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很多话题。正是在这个班级的课堂上发生了以下对话。一个阿拉伯学生说道：“最令我讨厌的是，当和我谈话十分钟之后，对方发现我的希伯来语中带有阿拉伯语口音时，他们就问‘你是阿拉伯人吗？’，‘你真是阿拉伯人吗？’，‘你确定你是阿拉伯人吗？’接着，谈话中断，他们就离开了。我的口音泄露了我的身份。”另一个阿拉伯学生针对这种现象接着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包着头的原因。这让跟我说话的人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是的，我是阿拉伯人，我不需要等到我的口音暴露了我的身份之后，才立刻表现出真正的自己。是的，我是阿拉伯人，一个自豪的阿拉伯人。”班上还有一个在以色列住了十年的苏联学生，当别人问她“你从哪里来”而她回答“以色列”时，这些人往往还会接着说：“但你真正的老家在哪儿？”还有学生会这样说：“老实跟你们大家说，在这个班里我们谈论的都是那些有关宽容、平等、抗议和共存等美好的话题。”然后，他转向班里的另外一个阿拉伯同学说：“但说实话，我

害怕你们阿拉伯人，因为我在家看电视时经常看见阿拉伯人进行自杀式爆炸，我怎能不害怕你们呢？我被恐惧打败了。”

在这个班里，大家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自由开放的，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学习了有关语言刻板印象（language stereotypes）和语言歧视的知识，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戴着眼镜”去“看清”语言歧视、语言身份和语言边缘化的现象，我们也学会了如何进行直接地批判和抗议。

最后是有关悲剧发生后对于撰写本书的思考：在痛失爱女之后要写一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当一个人在处理生与死如此重大的事情时，还怎么可能集中精力去研究一个问题或专题呢？我很能理解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 2002）写的《幻觉之书》（*The Book of Illusion*）里的主人公。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他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但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设法找到生命的意义：“表面上我的目的是研究并掌握海克特·曼（Hector Mann）的电影，但实际上我是在教育自己如何集中精力，训练自己如何思考且只思考一件事。这就是一位偏执狂（monomaniac）的生活，但这也是我防止自己四分五裂活下去的唯一方式。”（第27页）

生命和语言之间存在一条鸿沟，想要填补它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正是从以下这一点我开始看清了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谈到语言，人们可以在每一个生命中看到语言；谈到生命，人们也可以在每一种语言中看到生命。生命和语言有联系，语言和生命也有联系。我通过作品来进行语言交际，又通过语言交际来帮助写作。这样，我就摆脱了“偏执狂”的毛病。语言无处不在，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对其他事物的影响也是普遍存在的。我通过语言这个工具看到了世界、社会和我的个人生活，在语言的内部我也看到了这一切。我变得又能够观察事物了，我具备了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85，其观点贯穿本书）所描述的那种观察能力：“当我们想要观察这个世界，同时又想在这个世界被关注的时候，我们无须刻意等待那些幸运巧合之事的发生。帕洛马尔（Palomar）先生碰巧遇到过这样的巧合。或者说，帕洛马尔先生根本就无须等待，因为这些事情只有在你不等待的时候才会发生^①。”（第115页）

①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是意大利的记者和短篇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有《我们的祖先》（*Our Ancestors*）三部曲、《宇宙奇趣全集》（*Cosmicomics*）短篇小说集、小说《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和《寒冬夜行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他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享有盛誉，是当代意大利作品外译最多的作家。本书中多次引用的内容来自他的小说《帕洛马尔》（*Palomar*）。

导 论

尽管语言具有动态性、个体性、自由性和活力性，而且没有固定的边界，但是，总有一些群体和个体会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社会、经济和个人意识形态而对语言进行控制和操纵。因此，语言被用来创建群体身份（如“我们”或“他们”），体现入门资格（如“包容”或“排除”），判定行为性质（如“忠诚”或“爱国主义”），显示经济状况（如“拥有”或“匮乏”）以及划分群体或个人的身份。而且，还有人把语言当作控制别人的一种方式，他们强迫别人按特定的（如正确的、纯洁的、像本族人的、合乎语法的等）方式来使用特定的语言，甚至还干预别人使用语言的权利。

语言政策被夹在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的操纵和斗争中间。大多数掌权者（但不仅限于他们）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外显的（overt）和内隐的（covert）机制来操纵和控制语言，以便影响、制定和维持事实语言政策（de facto language policies），也就是语言实践。他们为了达到控制语言空间的目的，就会在对话、协商或激烈的斗争中公开或隐秘地利用这些政策机制。因此，为了能真正理解“真实的”语言政策，我们必须关注这些政策机制的结果，对这些受政策机制影响的语言进行观察并演绎。事实上，这些机制就是语言政策的工具。它们的效应和结果常常会违背民主的进程或侵犯个人或语言的权利。正是这些机制的存在以及它们对各种事实语言政策的影响，才构成了不为公众所知的隐性意图。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单纯的机制行为（如街牌的制作、学校语言测试的开展、学校语言政策或公民考试政策的制定）就构成了实际的语言实践，而且它们往往是在未经任何官方公告的情况下就实行了。一旦这一行为过程被公之于众的话，公众就有必要采取语言行动（linguistic activism），或通过这些机制进行语言抵制（linguistic resistance）。由此，从扩展的语言政策观来看，语言政策就会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广泛的协商和讨论。所以，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语言政策，例如从机制、政策、实践、协商、对话以及它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来理解。不过，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要关注政府和大